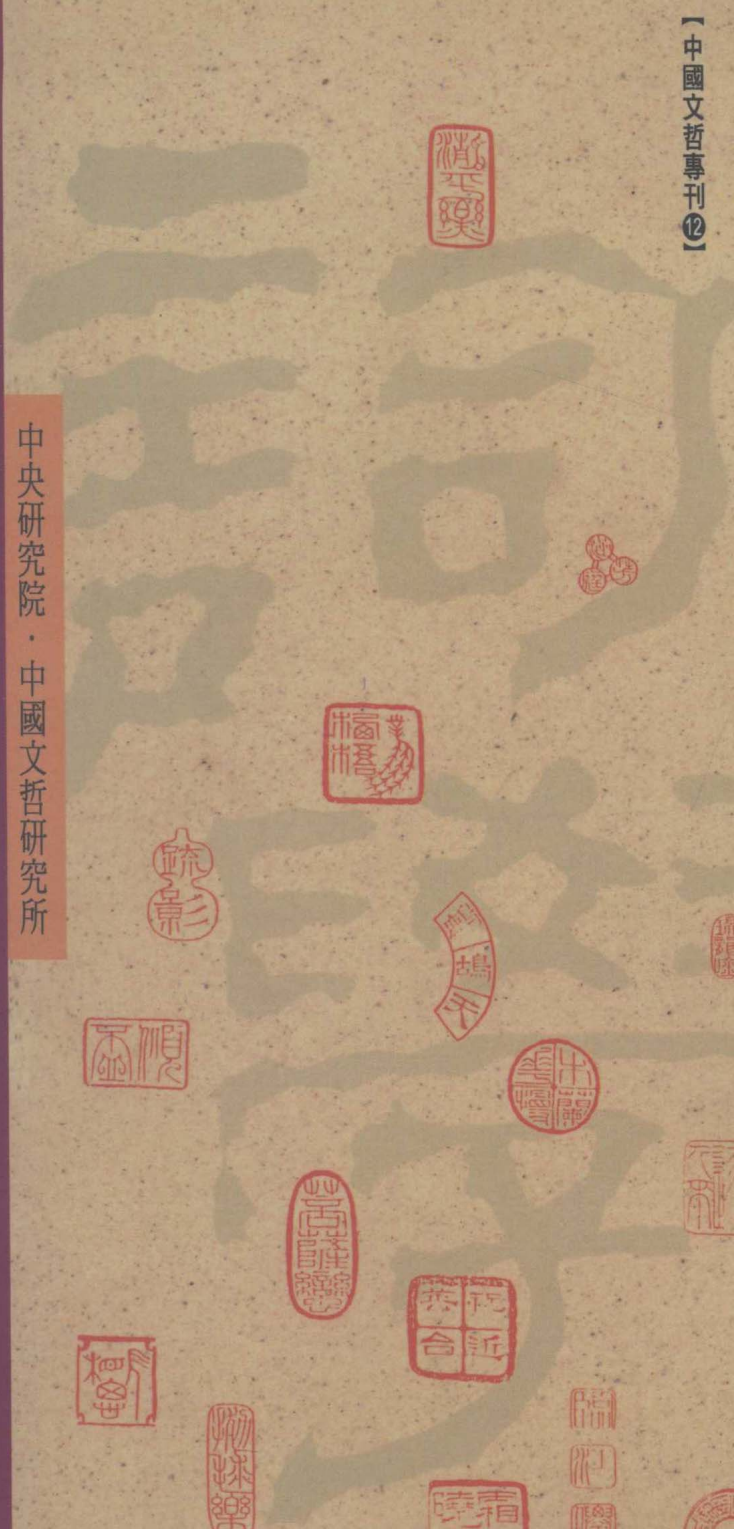


中央研究院 · 中國文哲研究所

清詞名家論集

葉嘉瑩
陳邦炎

撰



中國文哲專刊 12

清詞名家論集

葉嘉瑩 陳邦炎 撰

臺北 南港

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研究所印行

1996 年 12 月

清詞名家論集／葉嘉瑩，陳邦炎撰．--初版．--

臺北市：中研院文哲所，民 85

面；公分．--（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研究所中國文哲專刊；12）

ISBN 957-671-447-8(精裝)．--ISBN 957-671-448-6(平裝)

1. 詞 - 清(1644-1912) - 評論 - 論文，講詞等

823.87

85006702

清詞名家論集

作 者 葉嘉瑩 陳邦炎

發 行 者 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研究所

臺北市南港區研究院路 2 段 128 號

電話：(02)7899814；7883620

印 刷 秀威資訊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臺北市內湖區瑞光路 583 巷 25 號 1 樓

電 話：2 6 5 7 9 2 1 1

定 價 平裝本 新臺幣400元

精裝本 新臺幣500元

初 版 中華民國 85 年 12 月

掃描二刷 中華民國 93 年 12 月

ISBN 957-671-447-8（精裝）

ISBN 957-671-448-6（平裝）

出版說明

本處成立於一九八九年八月，次年正式聘請研究人員，推展研究工作。當前的研究方向有五：一、古典文學方面：著重於古典詩歌、散文、小說、戲劇、文學理論等之研究。二、近代文學方面：著重於清代中葉以後之白話文學、民間文學、中外文學比較，以及近現代、當代文學之研究。三、經學方面：著重於經學文獻、經學史及經學與文學、哲學關係之研究。四、中國哲學方面：著重於先秦諸子、中國歷代哲學思想，以及哲學與文學關係之研究。五、比較哲學方面：著重於中外哲學思想之比較及近代哲學相關問題之研究。

詞學為古典文學方面最先發展之重點。為推展詞學之研究，本處曾於一九九三年四月廿二至廿四日，假本院活動中心舉辦第一屆詞學國際研討會，會後並出版論文集。又於同年七月至一九九五年六月進行為期二年的詞學主題計畫，此為本院支持的大型群體研究計畫，由本處研究員林玫儀主持，參加學者共七人，重要工作有二項：一為清詞書目之蒐集整理，由本處諮詢委員饒宗頤、研究員林玫儀、杭州大學教授吳熊和及蘇州大學教授嚴迪昌共同負責；一為詞學專題之研究，由本處諮詢委員張以仁、研究員林玫儀、助研究員劉少雄及加拿大皇家

學院院士葉嘉瑩負責，分別就「花間詞」、「晚清詞論」、「近現代的詞學理論」及「清代名家詞」四個專題進行深度研究。

本計畫在執行期間，並曾舉行小型座談會及大型研討會各一次，就計畫相關主題與學者切磋討論。前者於一九九四年五月十四日假本處舉行，邀請學者七人，就「詞學研究之開展」為題進行討論；後者則於一九九五年四月十六日至十九日假上海華東師範大學召開，除本處同仁外，並邀請大陸學者二十餘人參加，計宣讀論文二十八篇，會後並出版論文集，收入本處「中國文哲論集」中。另在蒐集整理清詞書目之過程中，又訪得《鄭文焯手批夢窗詞》一冊，此書向未刊布，經原藏單位同意，影印流傳，編為「近代文哲學人論著叢刊」之五。

現本計畫已經結束，各項成果亦將陸續出版。除上述論文集外，清詞書目部分編為《清詞別集知見目錄彙編》，收入「圖書文獻專刊」；詞學專題研究部分則編入「中國文哲專刊」。本書原由葉嘉瑩教授負責，後葉教授要求與陳邦炎先生合作，經本計畫同意，改由二人合撰，並依序列為「專刊」第十二種。

序 言

葉嘉瑩

對於清代的詞與詞學，我本來早就有研讀的興趣，所以早在七十年代初，我就曾撰寫了〈常州詞派比興寄託之說的新檢討〉一篇文稿。其後於八十及九十年代中，又陸續撰寫了〈論陳子龍詞〉、〈論納蘭性德詞〉及〈論王國維詞〉等多篇文稿。我也本曾有意再多寫幾篇討論清詞的文稿，將之編輯為一冊更具系統性的清代詞與詞學的論集。所以當中研院文哲所的林玫儀教授於九三年向我表示要我為他們研究所的「詞學主題研究計劃」撰寫一冊論清詞的專著時，我乃毫不猶豫的就做出了爽快的承諾。而其後我卻於九三年的七月及十一月在美國耶魯大學及馬來西亞的馬來亞大學先後參加了兩次會議，而且在馬大會議後不久，又接到了新加坡國大中文系的邀請，要我於九四年赴新講學，我自忖在此匆迫的工作和行程中，實無力完成一冊研究之專著，遂與林玫儀教授相商，決定邀請國內學人陳邦炎先生與我一同合作來撰寫此書，幸而獲得了陳先生的惠然同意，我遂利用九三年底新加坡短暫的假期去了一次北京，邀約陳先生在京晤面，倉促間商訂了一個撰寫計劃。陳先生早在多

年前就曾撰寫過〈陳維崧評傳〉與〈徐燦傳〉等多篇文稿，而我則曾撰寫過前文所述及的諸篇文稿，因此遂決定各就原有之基礎並另外增選數家，以合編為一冊論集。陳先生不負約言，果然陸續撰寫了極具份量的四篇文稿，那就是收入本書中的〈評介陳維崧及其詞論詞作〉、〈評介女詞人徐燦及其拙政園詞〉、〈論雲起軒詞〉與〈陳曾壽及其舊月移詞〉四篇文稿（原來還有一篇〈論新蘅詞〉因已收入《詞學研討會論文集》故未計入）。至於我自己則說來慚愧，事實上我只撰寫了三篇文稿，那就是收入本書中的〈從豔詞發展之歷史看朱彝尊愛情詞之美學特質〉、〈談浙西詞派創始人朱彝尊之詞與詞論及其影響〉與〈說張惠言水調歌頭五首一兼談傳統士人之文化修養與詞之美學特質〉三篇文稿。及至今年一月，我因接受臺灣信誼基金會之邀請赴臺講演，遂得與林玫儀教授再度相晤，林教授告以我尚需為《清詞名家論集》再撰寫一篇文稿，始得湊足陳先生與我各有四篇之數，而截稿之時間則已極為緊迫，於是遂於倉促間又商訂了一個補救的辦法，就是我為文哲所做一次講演，然後由姚白芳女士整理寫出。此一講稿就正是目前以「附錄」編入此書的〈從雲間派詞風之轉變談清詞的中興〉一文。

從以上的內容來看，陳先生與我的選題可以說本是各自為政，除了避免重複以外，實在並未規定任何撰寫的系統和條例。但及至現在即將成書之際，我重讀全部文稿，卻發現在這些不同風格與不同論述的文稿中，似乎也隱然可以尋覓出一條貫串的線索。而且此一線索更與我最初想要撰寫一冊論清代的詞與詞學之專著時所構想的理念，也頗有暗合之處。

關於我最初想要撰寫「清代的詞與詞學」之理念，我在以

前所寫的諸篇文稿，以及本書所收錄的諸篇文稿中，也已經分別有所透露。我之本意蓋原在於想要探討清詞中興之主要因素與其所體現的詞之美學特質，以及清代詞學家對此種美學特質之體認與反思的過程。此種探討自應依時代之先後為次第，方能為之推尋出一條演進之線索。而如果依此而言，則本書中所附錄於最後的題名為〈從雲間派詞風之轉變談清詞的中興〉的一篇講稿，實頗具發端之重要性。在該文中我曾提出說，明詞之所以衰微與清詞之所以中興，主要乃在於雲間派諸作者在詞風之轉變中，竟然從詞之表層的美感特質，重新體現了詞之深層的一種美感特質。而這種雙層之美感特質，則原是早自唐五代《花間集》之一些佳作中，就已經形成了的一種詞之美感特質，其表層所呈現者為美女與愛情之敘寫，其深層所蘊含者則為豐富的言外之感發。在此種雙層之特質中，一般人所認知的原大多只是其表層之特質，《花間集》編選人之所取者也原是其「庶使西園英哲用資羽蓋之歡，南國佳人休唱蓮舟之引」的表層的歌辭之詞的美感特質而已。可是晚唐五代之際的戰亂流離，卻使得某些作者於無意間在其歌辭之詞的作品中，竟然流露了其潛意識中的某種憂危的情思，於是遂使得這些歌辭之詞，乃在表層所寫的美女與愛情的婉約柔靡的美感特質以外，更形成了一種含蘊深微足以引起讀者豐富之感發與聯想的深層的美感特質。不過一般的作者與讀者，最初對此卻並無明白的認知。兩宋词風之由歌辭之詞轉化為詩化之詞，又由詩化之詞轉化為賦化之詞，事實上就正是一些傑出的作者，先後對於如何突破詞之表層的美感特質，以及如何在突破之後還能保有一種雙層之特美的努力和嘗試。而且兩宋之時代固仍在詞體之發生與演

變的階段，於是晏、歐、柳、周、蘇、辛，以迄於南宋後期的夢窗、碧山諸家，乃能各以其襟抱、性情、才華、遭際，紛紛以不同之風格與意境，為詞之雙層美感開拓出不少嶄新的天地。不過，兩宋之創作雖有可觀，但在詞學的反思和體認方面，則並沒有可稱述的論著。所以一般人對詞的認知，就仍停留在詞為豔科，被視為小道末技的觀念中，明詞之衰微，主要就正由於明人對詞之深層的美感特質全然無所認知的緣故。雲間派詞人早期的作品，其所承繼者仍是明代之遺風，而造成其詞風之轉變，使之由詞之表層美感進入到深層美感之特質者，則是由於甲申國變所加之於這些詞人的一段苦難憂危的經歷。關於此種轉變，我在本書附錄之〈雲間派詞風〉及早期我所寫的〈論陳子龍詞〉兩篇文稿中，已有詳細之論述。現在我想一提的，乃是此種轉變對於清代之詞與詞學之發展所造成的影響。

先就此種轉變對清詞之內容所造成的影響而言，本來一般人之認為詞之但為豔科者，在經歷了慘痛的國變以後，乃發現了詞之參差委曲的形式，原來乃特別適合於表達一種憂危隱曲的難言的情思。於是自雲間派詞人以降，使用詞之體式以抒寫其易代之悲與身世之慨的作品，遂如葉恭綽在其《廣篋中詞》中論及「清初詞派」之所云：「喪亂之餘、家國文物之感，蘊發無端、笑啼非假，……分途奔放，各極所長。」頓時呈現出一片中興的氣象。這種現象的產生，其實就正由於時代之憂危既在作者之內心中形成了一種深曲難言的情思，而詞之體式則恰好又正適宜於表現此種深曲幽微之情思，於是時代之特色遂與詞之特殊美感相結合，使詞體之表達此種特殊情思的作用，得到了極好的發揮的機會。何況相繼於清初的易代之悲與身世

之慨的餘波與嗣響猶未全歇的時際，未幾就進入了滿清的道、咸衰世，外患內憂，接踵而至。於是自早期雲間派詞風之轉變，由詞人所經歷的憂患而重新振起的詞之深層的美感特質，遂得以相繼延承，歷清室之衰亡，而在晚清諸大家的詞作中，於是乃有了更為出色的表現。而這種由時代之憂患與詞人之憂思所結合而形成的詞之深層的美感特質，遂終於突破了詞之被人目為小道末技的局限，而拓廣和加深了詞之做為一種文學載體的意境和容量，於是詞在文學體式中的地位，在有清一代乃獲得了大幅度的提昇。不僅吸引了大批優秀的才人，投入了創作的行列，而且吸引了大批的學人，對詞籍之編校整理投注了大量的精力。而與以上所述及的詞之意境的拓展，及地位之提昇相表裡，而同時發展出來的另一極值得重視之成就，則是清代詞學家對於詞之深層美感之特質的體認和反思。

提到清代詞學家對詞之美感特質，及其意義與價值的反思，我們僅從《詞話叢編》中所收錄的清人詞話的數量之多，便已可概見其盛況之一般。要想對之做出有系統的仔細深入的探討，當然並非這一篇短短的序文之所能為。不過，縱使僅就本書中所編錄的幾篇文稿來看，我們卻也已經可以略微窺見此種反思之覺醒與發展的一點端倪。現在我們就將按照書中所論及的幾位作者的時代先後略加敘述。首先我們要提及的一位清詞大家，自然是為我們曾留有一千數百多首作品的才氣縱橫的詞人陳維崧。他的詞論中最為人所稱述者，就是他在《今詞苑·序》中，所提出的「蓋天之生才不盡，文章之體格亦不盡……要之穴幽出險以礪其思，海涵地負以博其氣，窮神知化以觀其變，竭才渺慮以會其通，為經為史，曰詩曰詞，閉門造車，諒

無異轍也」一段話。從這段話看來，陳維崧對於詞之所以異於詩之特美，雖然並無深切的認知，但卻已經對於詞之做為一種文學載體，其功能之可以含有極大之包容量，有了明白的覺醒。所以陳氏之詞一方面就詞之特美而言，雖不免有時會令人有「一發無餘」的憾惜，但另一方面則他在內容方面所做出的拓展，則確實已突破了把詞視為小道末技的狹隘的觀念，這是極可注意的。至於與其時代相近的本書中唯一的一位女性詞人徐燦，其《拙政園詞》則誠如陳邦炎先生所稱述的，表現了一種「男性詞人也少有的深沉的滄桑感和悲咽跌宕的唱歎之音」。徐氏雖然沒有什麼詞論流傳下來，但她在創作的實踐中，卻充份證明了她不僅也在觀念上已脫出了詞之為小道末技的但以柔婉為美的拘限，而且更在藝術上極為出色的表現了詞的一種深層的美感特質，後之論者往往將清代的徐燦與宋代的著名女詞人李清照相提並論，私意以為李氏之詞作雖亦有過人之處，但若就其對詞之容量與詞之雙層美感特質的體認而言，則李氏固仍未能完全擺脫早期歌辭之詞的美感觀念之局限，所以李氏雖然也身經北宋淪亡的國變，但在其詞中卻並未能做出更為深廣的發揮，而徐氏所生之時代，則自明清之易代對雲間派詞風之轉變造成了強大之影響以來，清初作者之在詞體中表現其滄桑之慨與身世之悲，蓋已成為一時之風氣，陳維崧就是在此種風氣中，提出了詞之可以具含更為深廣之功能的一位作者，只不過陳氏做為一個性格豪邁的男性作者，故其作品之風格乃表現為奔放者多，而沉斂者少；至於徐氏則以一位女性之作者，既由其家庭之背景自幼年就接受了與男性相同的教育，在國變中感受到了與男性相同的悲慨，但卻在另一方面又稟賦了女性之深微柔

婉的心性，所以徐氏雖沒有任何的詞論之流傳，但卻在其創作之實踐中，自然把詞之深廣的功能，與詞之雙層的美感特質做出了極為美好的結合。只可惜其出塞後之所作，未能流傳於世，否則固當如陳邦炎先生之所論「其中必多刻骨銘心、感蕩心靈之作」，不僅在女性詞人中足可稱為巨擘，即使就男性作品而言，如徐氏之所成就者固亦不易多見也。

以上兩家，可以說都是對詞之意境與功能方面既有了更為深廣的認知，而且在創作方面也表現出可觀之成就的兩位作者。至於依時代先後在本書中所論及的第三位作者—朱彝尊，則可以說是對詞之深層美感開始做出有意之反思與探索的一位作者。在本書中所收錄的〈談浙西詞派〉一篇文稿中，我對於以朱彝尊為首的浙西詞派之形成的過程，以及其詞論中之重要論點，與其得失之所在，都已曾做了相當多的探討。約言之，則朱氏詞論之成就蓋可分為兩方面來加以觀察，其一是他對於詞在意蘊方面之可以具含一種雙重美感的體認。關於此點，他在〈紅鹽詞序〉與〈紫雲詞序〉兩篇作品中，曾以外表看似矛盾的敘寫，分別提出了詞之表層雖具有「宴嬉逸樂」之性質，但在深層美感中，詞卻也含有一種可以使那些「不得志於時者」「可以寄情」的微妙的作用，這種體認當然是極可重視的。其二則是他對於「小令當法汴京以前，慢詞則取諸南渡」的兩種不同詞體之不同美感的辨析，這種辨析可以說是發前人之所未發，當然也是極可重視的。而且與他對南宋慢詞之特殊美感之認知相結合的，還有他的倡雅正而崇姜張的主張，此種主張，就南宋慢詞之美感特質而言，以及就朱氏之有意於糾正明詞的淫穢之作風而言，原來也並未可厚非。可是過於重視形式與文

字之雅的結果，卻使得浙派的詞風，逐漸成了一種浮薄空疏之病。於是乃有本書中所論及的第四位作者張惠言所倡導的，以比興寄託爲主的重視內含的常州派詞論之出現。我個人因爲早在多年前就已曾寫有專論〈常州派比興寄託之說〉的文稿，所以本書中所收入的一篇，原是對張惠言〈水調歌頭〉五首之詞作的評說，而並不是討論其詞學理論的作品，不過在討論張氏之詞作時，我卻也曾結合其詞論來加以評述。約言之則張氏的重視「言外」之意的比興寄託之說，表面看來自然似乎曾受有朱彝尊的〈紅鹽詞序〉所提出的「不得志於時者所宜寄情」之說的影響，但事實上則私意以爲清代詞論之所以對於詞之深層美感之逐漸有了愈來愈明白的認知，原該是由於我在前文所提出的，乃是時代之特色與詞之特殊美感相結合後，所產生的必然的結果。清代的作者既在詞之委曲的形式中，找到了最適合於表達他們的幽微深曲之情思的一個文學載體，則詞學家們透過了反思而逐漸認識到詞體之深層美感，便自然也就形成爲詞學發展的一個共同趨向了。只不過這一條反思與認知的道路，也仍是極爲曲折的，朱彝尊雖然曾經對此一特點有所認知，但卻並未能就此一特點加以發揮，而在其晚期詞論中轉向了對慢詞的形式之美與文字之安排的強調，因而遂產生了浮薄空疏之弊。至於張惠言雖然對此一特美有了更清楚的體認，但卻也留下了兩個無可諱言的盲點：其一是未能分辨出詞之深層美感的作用，與詩之比興寄託的有意識的拘執的喻說並不全同；其二是未能分辨出小令的自然感發與慢詞之安排勾勒的兩種美感作用之並不全同。所以張氏之詞論，乃在後世蒙受了不少「牽強比附」與「深文羅織」的譏評。不過儘管張氏有這些盲點，他

所提出的對於詞之富於「言外」之意的深層美感的特質的認知，也仍是極可重視的。而更可貴的一點，則是我在〈說張惠言水調歌頭〉一文中所提出的，張氏之「興於微言」之說所體認到的詞中之「微言」的微妙作用，只不過可惜的是張氏對此一微妙的作用，也未能做出更多的理論發揮。

除去在本書中我所提出的朱彝尊與張惠言二家的詞論以外，我在此還想略做補充的，則是常州詞論之繼起者周濟的詞論。周氏之詞論最可注意者有兩點：其一是對詞之深層美感作用有了更深的體認，他在《宋四家詞選·目錄序論》中，曾以極形象化之語言指出了詞之「言外」之意與詩之有意識的喻說的微妙的差別，說「讀其篇者，臨淵窺魚，意爲魴鯉，深宵驚電，罔識東西」，喻示了詞深層美感的一種雖可確感而不可確指的微妙作用。這種體認自然是極爲可貴的。其二是周氏提出了「詞史」之觀念，他在《介存齋論詞雜著》中，曾特別提出了「感慨所寄，不過盛衰」之說，以爲「詩有史，詞亦有史」，這種觀念之形成，私意以爲與我在本文所提出的清詞之中興乃是由於時代之特色與詞之特殊美感相結合的演進形勢，也有著極爲密切的關係。雲間詞派之詞風的轉變，就主要是由於明清易代之變，在士大夫的感情心態與身世遭際方面所造成的一種強烈的激蕩而促成的。自此以降，經歷了嘉道以來百餘年之內憂外患，直到清代之衰亡，一些優秀的詞人，都曾先後以詞這種委曲的形式，傳達了他們內心中的一種深曲難言的憂思。於是周濟所提出的「詞史」的觀念，遂在詞的創作中做出了實踐的完成。在這方面，正是陳邦炎先生的四篇極具份量的結合歷史背景與詞之藝術特色的論文，對此做了很好的發揮和論述。而其中〈論

雲起軒詞》一文，結合歷史背景之評述，則正可為晚清史詞之最好代表。至於其〈論舊月簃詞〉一篇文稿，則私意以為尤可注意。這不僅因為陳先生與其所寫的詞人之間有著家族的關係，知之深而言之切，也因為陳曾壽之身世及其感情心態，本來就有其特別合於詞之美感特質之處。而其表達藝術的深隱曲折之「微言」，也似乎更含有如周濟所說的使人「臨淵窺魚、意為魴鯉」的一種美感之潛能，多年來我曾一直勸說陳先生要寫一篇介紹蒼虬老人之詞的文字，如今果然能夠讀到了陳先生的這篇文稿，這自然是一件可喜的事。

至於我自己的文稿所偏重的則似乎是關於詞之美感特質的探討，除去以上已曾提到過的論〈雲間派詞風之轉變〉、〈談浙西詞派〉諸文稿外，另外我所寫的頗為繁瑣的兩篇長文，則是〈從豔詞發展之歷史看朱彝尊之愛情詞的美學特質〉，及〈說張惠言水調歌頭五首一兼談傳統士人之文化修養與詞之美學特質〉兩篇文稿。這兩篇文稿僅從題目來看，固已可見其內容之紛繁瑣雜之一斑。因此我實在不擬在此序文中更加重述。不過為了要想使此一篇序文有一個貫串的線索，我在此只想再提出一點來略加說明，那就是清詞之中興，雖然乃是由於時代所造成的詞人之憂思，與詞體之特美相結合所形成的結果；但詞體之特美卻並不是只適於表達時代的憂思之思。即如朱彝尊之愛情詞、與張惠言之談士人修養之詞，就都並不是屬於此一類內容的作品。但也就正由於這些不屬於此類內容之作品，卻同時也具含了詞之此種特美的品質，遂使得我們能夠窺見了詞體之更為基本的一點特質。關於此種特質，我在論〈朱彝尊愛情詞〉一文中，也曾經嘗試為之擬想了一個名目，稱之為「弱德之美」，

並且曾指出詞之能表現出一種深層之特美者，往往乃是由於其有一種「難言之處」。並且曾舉出豪放派詞人中之蘇、辛兩大家來做為例證，以證明詞之風格無論其為婉約或豪放，但凡屬表現有詞之特美的佳作，蓋無不寓含有此種「弱德之美」的特質。朱彝尊的愛情詞，其所表現者之為一種「弱德之美」，且有其「難言之處」，固不待言，至於張惠言之寫士人之修養的五首〈水調歌頭〉，則私意以為實在也具有此一種特殊之美感，我這種說法，初聽起來，也許並不易被一般人所接受，但如果就儒家修養之本質而言，則儒家所重視的「克己復禮」的功夫，其自我約抑的操守，實在就正是一種「弱德之美」，而且如我在〈說張惠言水調歌頭五首〉一文中之所言，儒家修養之最高境界實在並不易於完美的達致和完成，要想將個人對此種修養的深微的體會，用語言來加以說明，當然也自有其難言之處，而這也正是張氏的這五首詞之所以能表現有詞之深微曲折之特美，而與平板僵硬之說教者，有著截然之不同的緣故。

本書中所收錄的幾篇文稿，就整個有清一代之詞與詞學之中興的成就而言，固不過僅如蠡海之一酌，本文之所寫，只不過是想嘗試在這幾篇內容與風格並不盡同的文稿中，為之尋覓出一條聊可貫串的線索而已。

最後我要為個人之因瑣事忙碌，既未能全力投注於寫作，更於最後不得不以一篇講稿來做為附錄以完成我個人所應負擔的撰寫之篇數，來向文哲所表示極大的歉意。同時也向陳邦炎先生之惠允合作的大力協助，表示誠摯的謝意。

一九九六年六月五日夜完稿於溫哥華

